

学术好伴侣,怎么成了“问题知网”?

■本报记者 秦志伟

近期,翟天临事件仍在发酵,不知“知网”为何物的他不仅牵出国内艺人论文造假的问题,也让此前涉嫌学术资源垄断的中国知网(以下简称知网)再次陷入争议。知网,这个中国最大的学术电子资源集成商,因强势提高服务价格,已多次遭到来自各方尤其是学界的质疑。

鉴于学术数据库的特殊性,其对权威学术资源的版权垄断具有一定合理性。事实上,类似的涨价行为及其引发的争议在国外学术数据库运营身上也时有发生。

然而有学者指出,这种看似合理的“垄断权”容易被滥用,“当学术数据库不再把版权保护作为激励创新的催化剂,而是将其当作攫取高额利润的手段时,其行为便涉嫌违法了”。

“他们越来越霸道了”

不同于国内期刊出版社,几大国际出版社因财力雄厚,不仅出版期刊杂志,还运营数据库。“国内期刊由于出版单位小、散、弱,不仅出版技术相对落后,也缺乏运营数据库的能力。”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社长姜永茂告诉《中国科学报》。

但出于生存需要,国内期刊也希望借助在线学术入口扩大自身影响力,其通常做法是以低廉的价格将数字出版权转让给数据运营商。

“我国学术数据库运营商扮演着信息中介的角色,提供的增值服务有限。”中科院—马普学会计算生物研究所生物医学大数据中心副主任张国庆研究员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知网也扮演着这样的角色。知网始建于1999年6月,由清华大学和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股份)共同发起创建,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中文信息知识服务提供商。

知网母公司同方股份的财报显示,2018年上半年,知网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亿元,毛利率为58.83%;2017年知网主营业务收入9.7亿元,毛利率为61.23%。这样的增长态势,与其连年涨价不无关系。

作为一名图书情报员,江苏某高校的王启云从2000年开始与数据运营商打交道。多年来,王启云的突出感受是,“他们(数据运营商)越来越霸道了”。

据了解,知网一般会根据购买单位的并发用户数(即可同时登录使用数据库产品的用户数量)、所选学科范围、地域差异、办学层次、办学规模等差异而采用不同的营销策略。

“以我们学校为例,知网每年都主张10%的涨幅,而我们与其的谈判工作进展很艰难。”王启云说。

此外,知网还会不断“创新产品”。比如从2018年开始,知网推出“学术期刊个刊数值版统发”,据称是国内传统出版行业整改内容质量重建的一项尝试。简单地说,知网把使用率高的几百种期刊的数据资源抽取出来另行销售,以增加利润。

2016年1月,武汉理工大学因签订知网服务价格过高而发布了停用知网的公告。据称,从2010年到2016年的报价涨幅为132.86%,年平均涨幅为18.98%。同年3月,北京大学也发出即将停用知网的公告,原因同样是涨价过快,价格过高,超出图书馆的预算费用。

但现实是,高校离不开知网。据了解,目前知网已签下期刊8000余种,独家和唯一授权期刊2300余种,实现核心期刊独家占有率高达90%以上。



服务价格频受质疑

实际上,知网涨价问题由来已久,部分高校不得已或暂停使用或展开“拉锯战”的谈判,但最后胜利方似乎永远是知网。

那么,知网长期占据卖方市场的原因何在?

《中国科学报》尝试联系知网,其内部工作人员以“正处在特殊时期”为由婉拒了采访。据记者了解,知网目前正在针对外界反映的问题进行整改,包括此次翟天临事件中其论文是如何通过自己的查重系统的。

知网成立之初,原新闻出版总署便将其“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作为国家标准正式下发执行。这就意味着,各大高校若想让图书馆论文检索系统联网,必须遵循这一规范。

以清华大学为首的全国各大高校纷纷加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开始成为高校学术论文的“收割机”。知网成立当年,“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还获得教育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官方的支持仍在继续。从2011年开始,教育部相继要求对本科、硕士和博士论文进行检测,再次加速知网在各大高校的应用。

以硕博学位论文检测为例,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北京大学法学院等开始启用中国知网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它的数据比较全,官方也认它。”王启云说。

同时,知网又被批准为我国唯一可以正式出版博士学位论文的学术电子期刊。在张国庆看来,正因这种唯一性,让知网有了涨价的

底气。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既然有教育部等官方机构的支持,知网就不能完全按照商业化模式操作,应该兼顾公益性。

实际上,知网的定价标准也是学界关注的问题。早在2014年,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发表《十问数据库商!!!》一文,引起较大反响。其主要关注的问题即在于数据库的定价依据是什么。张国庆表示,数据库运营成本应该是可控的,但他也不清楚它们的标准为何不够透明。

如今,知网的数据来源已经非常清晰。上游是期刊杂志和硕博学位论文,下游是各大高校、科研机构。论文发表者对于这样的声明并不陌生,即要求作者默认在投稿的同时将信息网络传播权也授权给期刊。但这种声明在法律上的效力一直存有争议。

根据知网和高校签订的合作协议,论文作者一般只能获取几十至几百元不等的稿费或阅读卡等价服务。为此,学术圈内曾有“我们不是论文的生产者,而是知网的搬运工”的吐槽。

开放数据是一种可再生能源

在姜永茂看来,学术数据库运营商涨价是一个普遍性问题。比如学术出版业巨头爱思唯尔,凭借《细胞》《柳叶刀》等顶级学术期刊长期占据全球出版社排行榜前列。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孙晋等人撰文介绍,2000年爱思唯尔进入中国,国内用户需每年至少订购其出版的2万

美元纸质学术期刊,再支付约3万美元才可以使用其旗下的SD数据库的全部功能。

短短几年间,300多所办学层次较高的高校图书馆及部分重要科研机构成为爱思唯尔的用户,其用户增速惊人。从2008年开始,爱思唯尔将其SD数据库的使用价格以大比例涨幅进行提价,部分用户单位的年均涨幅达到16.7%。

2010年,我国30多家图书馆联合抵制以爱思唯尔为代表的国外数据库涨价行为,称这种行为已严重威胁到所有教育科研单位文献资源的可持续保障。

知网的销售模式也借鉴了爱思唯尔等大型学术数据库的做法,“但由于国家法律制度不同,爱思唯尔数据库的垄断虽受到国外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关注,但尚未遭受处罚”。

孙晋告诉《中国科学报》,知网对于不同专业影响因子位列前茅的期刊的数字出版权的垄断属于合法垄断,受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保护。他同时指出,知识产权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保护和促进创新,一旦有经营者利用其掌握的知识产权而实施不公平高价、搭售或不合理交易,便涉嫌违反我国《反垄断法》。

孙晋认为,执法机构应该对知网展开调查,以确认其是否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从事经营活动的情况。如果能够确认其违法,应当对其进行相应处罚。

他同时建议,各行业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期刊可以联合开源,对外开放其期刊收录的文章,从而实现学术文献的“开放获取”。

作为一种学术信息交流与共享模式,开放获取消除了付费和使用许可等障碍,有利于全球科技成果的资源共享。“相比其他国家,我国学术论文开放获取机制起步较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张志刚等人研究认为,在早期的开放获取平台建设过程中,往往是由图书馆、高校或出版社进行推动。

人们常说,“数据是新石油”。但它与石油不同的是,开放数据是非排他性的、非竞争性的,因此近年来学界呼吁公开由公共资助的研究数据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2018年,来自法国、英国、荷兰等11个欧洲国家的主要科研经费资助机构联合签署了论文开放获取计划。内容为:从2020年1月1日起,所有由上述机构及欧洲研究委员会拨款支持的科研项目,都必须将研究成果发表在完全开放获取期刊或出版平台上。

正如一位国外学者所说,开放数据更像是一种可再生能源,它可以重复使用而不降低其原始价值,从而创造新的价值。

链接阅读

中国知网市场纠纷案例

中国知网设置“最低充值金额限制”

2018年5月25日,大学生刘某为下载一篇7元的文献,按要求充值50元,下载完文献后,刘某要求退还余额,中国知网客服表示退款需要手续费,且退款程序复杂,周期较长,建议刘某继续使用。后来因问题未解决,刘某将知网诉至法庭。近期,法院根据相关法律判定,中国知网的规则侵犯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限制了消费者的权利,是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应认定无效。日前中国知网已对收费方式进行了调整,下载文章可通过短信方式充值,可以选择0.5元、1元、2元等小金额充值方式。

未经授权将作品放在中国知网平台

2017年6月,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以下简称文著协)发现,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和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未经授权,通过电子化复制,将9种期刊、杂志上刊载的涉案作品放在中国知网平台上。随后,文著协将其诉至法庭。根据相关法律,法院判定中国知网侵权。

中国知网侵犯学位论文著作权

2008年,78名硕博联合状告知网数据库侵犯学位论文著作权;同年,104名硕博学位论文作者以侵犯学位论文著作权为由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等诉至法院,要求停止侵权,迫使知网删掉2000余篇没有取得授权的学位论文。



难忘的八年

■白介夫

1957年2月初,我被调到石油研究所(现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担任党委书记、副所长,至1964年8月调离。近8年的工作,成为我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段经历。当年的人和事,经常在我心中萦绕,成绩与失误,顺利与挫折,都与大连化物所里的人与事紧紧相联。

在去研究所之前,我干过几年记者,也做过一些县市的党政负责工作,算是有点文化和工作经验,但一进研究所,面对专业性极强的科技工作及众多的科研人员,我痛感“外行领导内行”的苦闷。于是我把所里的每位同志都当成老师。张大煜和萧光球都教过我催化剂的课,我还请楼南泉给我上化学课。我的网球也是萧光球教的……在不断请教的过程中,我逐渐懂得了一点业务,也了解了所里的科研人员。徐晓同志曾非常善意地批评我:“不要老说自己是外行,不要把研究工作看得那么神秘。”但是,对工作没有发言权又身居领导岗位,只有过来人才深知其中的酸甜苦辣。

到职的第一件有争论的事是水煤气合成项目。该项目曾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三等奖,2000元奖金怎么分配?是课题组的主要负责人、技术人员、值班员工平均分配呢,还是为了体现科学家的意义,主要的研究人员可以多拿。由此引发有趣的“打鬼子理论”。甲说:“没有熟练的射击技术是打不着

兔子的。”乙说:“我不告诉你哪里有兔子和兔子出没的规律,你技术再高明也打不着。”丙说:“负伤致死的兔子在那里,我不爬山涉水去捡,还是没有兔子。”这种半开玩笑的议论,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平均主义思想。这也是我日后工作中经常碰到的问题。

第二个难题是如何处理政治运动和科研工作的关系。在近8年的过程中,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都对研究人员和研究工作形成不同程度的冲击。处理好政治运动中的知识分子问题,政治运动和科研业务的关系问题,是对领导工作的考验。尽管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党组,在每次运动中都尽可能地减少对研究工作的干扰,制定适应中国科学院的政策界限,但实际工作中仍免不了受大形势的影响。越来越大的压力使我感到:研究所再抓不出右派,可能要牵连到我这个主要负责人。轻则思想右倾,重则你就是右派。周围好心的同志也向我暗示同样的顾虑。在那种不正常的气氛压力下,研究所后来终于出了几个“右派”,我深知这是个人得失的后果。为此我曾向有关同志道歉作过自我批评。这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违心的事。

2000年8月,我回大连,当年年轻油室的龙鹏振来看我时说:“当年你曾在全所大会上说过,助研可以回家看书,但不要为老婆服务的话。在当时这可是石破天惊的话。”我是

否说过这样的话,已记不清了,但要充分发扬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是我当时最主要的思想。为了减少对研究工作的干扰,我曾提出:行政处室和研究室的党政工作人员要参加业务学习,要树立为研究工作服务的观念,事务性工作,党政干部、包括研究室专职党支部书记应多承担。

1962年7、8月间,石油研究所在青岛举行会议,决定将大连石油研究所改名为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这是在我工作期间研究业务中的一件大事。应该说这不是某一个人的创见,也不是某几个人利用职务作出的决定,而是工作发展的必然,是学术争鸣、发扬学术民主的产物。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满铁中央试验所”遗留的基础条件下,解放后,国家创建了石油研究所,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天然气石油产量极低的情况下建立的。石油所在催化剂和色谱分析等方面的研究,为国家作出过重大贡献。随着国家的发展,石油所觉察到,对全所研究人员长远的学科领域导向不能缺席。特别是作为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既要出成果,又要出人才,不应仅仅局限于生产性很强的石油研究。研究人员经常议论,一个研究所,没有紧密结合生产建设急需的课题,研究人员干劲不大;如果没有长远的学科目标,研究的学科方向便不明确。这个话题延伸到学术领域,往往表现为研究人员

对研究课题的争论。当时所里科研民主气氛很好,我印象最深的是朱葆琳和卢佩章同志关于色谱研究的争论。他们从实验室争到回宿舍的路上,从白天争到深夜。据说有一天晚上10点多,他俩还在宿舍窗外争论。以至于有人半开玩笑地跟我说,这影响了他们的休息。但他俩没有因争论而伤感情。

这个话题自然也是张大煜同志经常和我谈起的,我请教过朱葆琳、张存浩、萧光球、郭和夫等人。

记得朱葆琳曾给我阐述科学和技术的问题。他说有些成果只能算是技术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这里不存在科学和技术谁高谁低的问题,都是重要的。为了说明研究成果的区别,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时任所长李寰同志曾半开玩笑地说:我的研究成果装在两个口袋里,如果是同行,懂得科研的人,我给他看一个口袋;如果是主管生产工作,关心当前经济建设的人,我给他看另一个口袋里的成果。我意识到这是基础研究、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问题,也是石油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改名字是大方向的大问题,除了在日常讨论中涉及外,学术委员会也多次论及。学委会的民主气氛在这个问题上充分的体现。当时有两个代表性的人物:张存浩,人们戏称为“张晋进”;陶隼生,人们戏称为“陶保守”。(实际上张存浩也不是冒进,陶隼

生也不是保守,只不过他俩的意见有分歧而已。)他俩在学委会的讨论中,经常发表针锋相对的意见,激烈地争论,友好的结束。

为了解决涉及研究所前途的、出成果出人才的大问题,1962年在青岛举行会议期间,应该说除了讨论学科方向外,还议论到人才培养问题。张大煜、朱葆琳同志在日常讨论中经常提到何国钟、丁景群、袁权等人,认为他们是一批有科学素质的青年。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实际上是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对待的。青岛的会议为大化所的发展,起了打基础的作用。

大连化物所几十年来在出成果出人才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不是哪一件事、哪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全所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大连化物所的目标是向世界一流研究所迈进,我深信,在已有的工作基础上,继承良好的学术民主、学术争鸣的传统,保持党组织和科研人员的良好关系,坚持出成果,出人才的大方向,一定能够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作者简介:

白介夫(1921.01—2013.04.04),男,1957年4月至1964年8月在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工作,北京市第六、七届政协主席,曾任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北京市副市长等职。